

基于中国经验证据的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研究

刘爱东 赵金玲

摘要：本文从三个维度提出了14个测度应对反倾销能力的初始变量指标，构建了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模型。基于135份有效样本采集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初始指标进行了筛选，确立了最终测度指标，并对模型进行了拟合度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所设计的指标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测度模型具有较好拟合优度。最后，采取主成份分析方法应用该指标展开了算例研究。算例结果说明，所提出的指标与测算方法可以较好的测度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有助于挖掘影响应对反倾销能力的瓶颈因素，提升应对反倾销能力。

关键词：WTO反倾销；测度指标；指标测算；评估

一、引言

由WTO统计数据可知，1995-2009年的15年间，全球进口国总共提起反倾销指控案件3865起，其中针对我国的高达746起，占据总体份额的19.3%。在这15年中，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案件数占全球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比重，由1995年的12.73%上升到2008年的35.1%，增长了22.37%。

2009年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这一年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达到75起，是过去的15年中国外对华提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最多的年份。这说明国外对我国反倾销势头未减，我国已成为遭受反倾销指控受害最大的国家。考证历年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案件显示，我国企业未参加应诉的情况占了相当大比例，应诉信心不足和应诉败的案件也并不鲜见，这与应对反倾销能力紧密相关。有学者通过研究国际反倾销运作情况和我国企业历次应诉获胜的经验，认为应对反倾销，除了企业作为应对主体必须提高自身应对能力外，政府与行业协会给予的支持力度也至关重要。然而，实地调研发现，大多数企业在常态下对应对反倾销能力没有全面的了解。因此，从这几个层面入手，构建测度应对反倾销能力的指标，尝试对其进行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企业应对反倾销会计联动机制研究”(70772039)、2010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应对反倾销的成本防护能力评价体系研究”(2010ZDB51)和2009-2010年中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创新选题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刘爱东：中南大学商学院；赵金玲：中南大学商学院，中南大学校本部商学院 410083 电子信箱：jean1606@163.com。

实际测算,设计提高应对反倾销能力的策略方案迫在眉睫。

二、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初始指标选取与测度模型构建

应对反倾销涉及“多元利益相关方”,如应诉企业、调查当局、行业协会、涉案产品上下游等。为了提高应对成效,仅依靠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是不够的。在我国基本形成了以企业为应对主体,行业协会协调,政府支持的“三位一体”应对机制。因此,考核我国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就不能单一从企业视角来衡量,必须考虑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与政府的支持力度。通过对现有文献类属性分析发现,针对反倾销背景下,企业、行业协会与政府如何应对的研究并不鲜见。冯巧根(2004)认为应诉反倾销,企业应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实行差异化和价格战略,同时政府需要通过会计标准体系的国际化来维护我国企业的利益。潘煜双(2004)认为我国企业要达到市场经济地位,必须有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记录。而周友梅(2003)提出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包括:出口企业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行业协会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政府机关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和中介机构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会计这个支持系统在国际反倾销诉讼中,无论是应诉环节还是申诉环节都必不可少。孙铮、刘浩(2005)指出应诉反倾销贸易救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当在企业管理方式、出口策略、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引导与配合等决策与宏观层面,多方面协同行动才会不断促使中国国际贸易健康、快速发展。冯巨章(2006)的研究发现,在反倾销联合应诉过程中,商会等行业组织的良好发展是保障协商解决联合应诉困境与提高应诉力度的关键所在。林珏(2008)建议我国出口企业可以通过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和市场竞争行为,减少反倾销风险;还可以依靠完善会计制度;建立反倾销应诉部门;加强反倾销应诉人才的培训;调整企业产品结构与经营战略;运用进口国法律据理力争;重视问卷调查填写工作;积极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等方式积极应对。刘爱东、陈林荣(2010)着重从完善我国战略支持体系和整体性竞争制度安排入手对应对反倾销进行研究,构建了政府、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企业“三体联动”的应对反倾销联合机制,并通过来自实践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上的相关研究启发了本文的研究构想,并为筛选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初始指标提供了理论支持。

笔者所在课题组在扎根理论指导^①下,在全国范围邀请了来自反倾销涉案企业的管理和财务高管、有关政府部门中参与应对反倾销实务的人员,以及行业协会工作者21人就如何应对反倾销和应对能力的测度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并经由三位博士生对访谈笔记、录音数据,采用开放式、关联式、核心式登录处理。访谈发现,实务工作者们对构建应对反倾销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三体联动”机制基本达成了一致,认为在应对反倾销时三者必须协调配合,发挥集成效应,提高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与成效。大部分受访对象表示强有力的举证是应对反倾销获胜的关键性因素。企业作为应对反倾销主体,面对反倾销时快速的响应能力和自身高水平的成本会计管理水平是能够从容应对反倾销诉讼的基础。政府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

^①扎根理论是Barney Glaser和Anselm Strauss两位学者共同发展的质性研究方法,是在系统收集资料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并通过概念间联系建构相关理论。

提供的支持能够提高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比如行业协会是企业自愿加入的、非营利的、以增进共同利益的自律性的社团法人,具有自律、协调、互助、服务、交流、调解和制衡等属性。在面临应对反倾销时可以协助企业建立反倾销会计信息系统、协助企业填写调查问卷和应对反倾销调查机构现场会计核查、协调行业内产品制定合理的出口价格等,这些行为能够大大提升微观层面企业应对反倾销的能力。受访对象中95.6%以上实务工作者认为企业应对反倾销快速响应能力和企业产品成本会计管理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近八成的人认为可以根据政府与行业对应对反倾销的重视程度、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以及发布与反倾销相关信息完整程度等方面对政府与行业协会的支持力度进行测度。本文在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访谈意见,选取了测度反倾销应对能力的初始指标,具体如表1。

表1 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初始变量指标

维度	系数	指标变量
F ₁ 企业产品成本 会计管理水平 CBGL	CBGL1	企业会计处理与会计准则符合程度
	CBGL2	企业会计处理遵守相关法律一致性
	CBGL3	会计记录的完整性
	CBGL4	会计附件的有效性
F ₂ 企业快速 响应能力 KSXY	KSXY1	企业高管对应对反倾销重视程度
	KSXY2	企业应对反倾销人员能力水平
	KSXY3	企业与政府、行业协会等沟通能力
	KSXY4	企业对国际反倾销动态与贸易规则了解程度
	KSXY5	国际贸易惯例、反倾销法律框架和反倾销会计标准等多维信息系统建设
F ₃ 政府、行业协 会支持力度 ZFHY	ZFHY1	政府、行业协会等对应对反倾销重视程度
	ZFHY2	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度
	ZFHY3	发布与反倾销相关信息的完整程度
	ZFHY4	制定企业产品出口规则
	ZFHY5	反倾销预警体系参与度

表1中从三个维度层面对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初始指标进行了设计与划分。本研究认为可以将企业产品成本会计管理水平、企业应对反倾销快速响应能力以及政府、行业协会的支持力度三个维度作为潜变量,各潜变量维度具体测度指标作为观测变量对以企业为主体的应对反倾销能力(YDNL)进行测度,基于这一构想可设计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模型如下图1。

三、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筛选

根据研究问题的属性与相关资料获取难易程度,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方法对测度指标进行筛选。具体研究方案如下。

(一) 问卷设计

在明确了本研究目的前提下,将专家学者们的观点运用类属分析法进行整理,通过专家访谈、电话采访与面谈的方式进行了信息收集,构建了初始评价指标,形成了初始问卷。本研究问卷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二是所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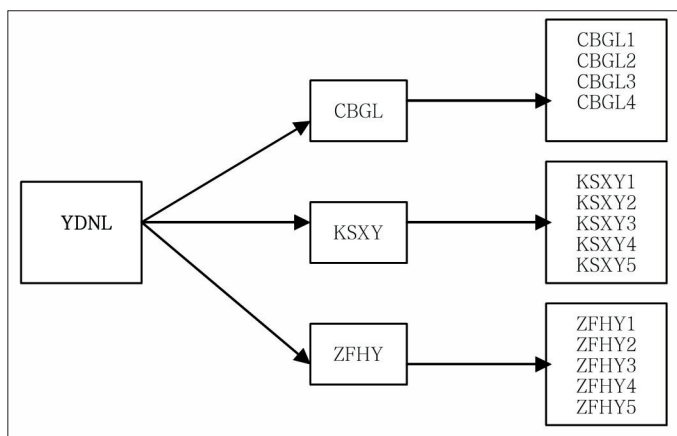


图1 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模型

的初始评价指标题项。采用李克特 (likert) 5点尺度, 5分表示完全同意、4分表示同意、3分表示中型评价、2分表示不同意、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请被调查者对每个题项能否测量我国应对反倾销能力表明个人意见, 选择相应分值。

(二) 样本选择与调查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涉案企业反倾销应诉人员、政府部门中参与了应对反倾销的公务员和行业协会参与应对反倾销的工作者填答问卷。为优化样本来源结构, 还把科研单位相关研究者也作为调查对象。问卷发放形式: 一是邮寄; 二是电子邮件形式; 三是实地发放。为增强问卷有效性, 避免正式调查问卷中可能存在一些疏忽和遗漏, 影响调研结果, 问卷正式发放前, 在请教有关专家、相关单位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和反馈, 开展了预测试和先导测试, 进而强化了问卷清晰度和指标合理性, 最后编制成正式的调查问卷。

(三) 初始问卷预测及先导性测试

问卷正式发放前, 邀请4位专家、4位具有5年以上反倾销应诉经验的人员开展预测试。预测试目的是让被调查者从各自专业领域角度对测试内容、题项选择、问卷格式、指标设计合理性等进行检验。总体上, 8位被测试者都能够分别独立完成问卷, 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笔者在综合分析反馈意见基础上, 对初始问卷进行了修正。

预测试之后, 笔者对修改后的问卷进行了先导测试。选取了3家涉案企业、2家行业协会、3个有关政府部门作为抽样单位发放了61份问卷, 测试对象能够认真清晰地完成问卷, 并提出修改意见。笔者综合各个修改意见, 对问卷题项进行了调整、修改, 使其更加易于选择观察。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 系数对先导测试的61份问卷进行初步信度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除指标ZFHJ4制定企业产品出口规则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 系数为0.29, 低于0.45的标准没有通过检验外, 其他各指标变量Cronbach' α 值分布在0.7035-0.8379间。采用Cuieford观点来判定, Cronbach' α 大于0.7为高等信度。因此, 可以判定先导测试中所采用的问卷能够满足信度要求。经过预测试和先导测试的筛选, 笔者删除了指标ZFHJ4, 保

留了剩余13个指标变量用以测度应对反倾销能力，并对问卷中部分题项的表述做了进一步修正和调整。

(四)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本研究对商务部、中国钢铁协会、中国五矿集团、中联重科、衡阳钢铁厂、长沙纺织厂、永州跃进、岳阳纸厂、中南大学等有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涉案企业人员以及国内多所高校中从事相关理论研究的教授和副教授、讲师和博士研究生等专家共发放问卷362份，最终回收问卷148份，剔除缺项太多、极端性反应严重以及矛盾明显的问卷，有效问卷13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37.29%，满足调查研究中样本回收率不低于20%的要求。

1. 数据处理技术方法。本研究对回收的问卷数据采用SPSS15.0、Excel2003、LISREL8.54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所收集数据的信度、效度检验，通过实证研究最终确定测度应对反倾销能力的指标。

2. 调查样本结构分析。通过对调查样本的结构分析可知，调查样本的年龄主要集中在45岁以下，所占比例为93%，说明以中青年为主；同时被调查对象，其中具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占52%。

被调查对象来自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和学校、科研机构等企事业单位。其中来自实务部门的调查对象占总体样本近70%，剩余调查样本是来自科研机构与高校，这样的配置比例提高了信息获取的全面性。总体上调查对象基本分布统计情况表明问卷填写的质量可以得到保证。

3. 信度与效度检验。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测度指标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样本数据进行KMO样本检验和Bartlett球体检验，KMO检验是用于比较观测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值的指标。Kaiser指出：KOM值小于0.5时，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型检验是检验相关矩阵是否是一个单位矩阵，若Bartlett球型检验值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各指标间具有相关性，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样本KMO值与Bartlett球体检验数据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检验数据结果表明：KMO值为0.807，大于0.5，符合要求；Bartlett球体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01，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因此，这组数据很适合作因子分析。

表2 KMO and Bartlett's Test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sequacy	0.807
Bartlett's Test of Approx Chi-Square	911.481
Sphericity	df
	Si.
	0.000

信度是测量结果具有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信度分析是为了验证各个测量指标的可靠性，也就是不同测量者使用同一测量工具一致性水平，反映相同条件下重复测量结构近似度。本研究采用SPSS15.0软件生成这一系数，检验指标信度。一般情况下，如果内部一致性系数大于0.7，则认为问卷的信度很高；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0.5至0.7之间，问卷就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如果某一因子这一信度值比较低说明调查对象对这一问题看法差异性较大。此外，还运用LISREL8.54软件对观测变量信度检验值(R^2)与潜变量组合信度检验值(CR)进行数据分析。开展验证

表3 问卷信度检验值

潜变量	Cronbach' α 值	CR	观测变量	删除观测变量后 Cronbach' α 值	R ²
CBGL	0.870	0.6803	CBGL1	0.850	0.55
			CBGL2	0.830	0.65
			CBGL3	0.816	0.72
			CBGL4	0.840	0.59
ZFH Y	0.848	0.6511	ZFH Y1	0.796	0.64
			ZFH Y2	0.803	0.60
			ZFH Y3	0.789	0.67
			ZFH Y4	0.837	0.45
KSXY	0.886	0.6770	KSXY1	0.861	0.67
			KSXY2	0.836	0.86
			KSXY3	0.843	0.75
			KSXY4	0.885	0.39
			KSXY5	0.877	0.46
量表总体 Cronbach' α 值 :0.880					

性因子分析时,由于需采用 LISREL8.54 默认的极大似然估计法 (ML) 进行参数估计,所以首先要检验数据是否符合多变量正态分布假定。检验结果显示,13个观测变量的 Skewness 系数绝对值介于 0.00-0.89 间,均小于 1, Kurtosis 系数的绝对值介于 0.00-0.95 间,均小于 1,故符合正态分布的假设。因此,可利用 LISREL8.54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各具体检验值见表 3。

表 3 显示各潜变量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达到 0.870、0.848、0.886,全部超过 0.70 的标准;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0 远超过 0.70 的标准;在各潜变量维度内分别删除选定观测变量后内部一致性系数全部小于未删除前各潜变量内部一致性系数,说明各潜变量内部各指标存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此外, R² 作为观测变量信度检验值是评价观测变量在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及每个载荷统计是否具有显著性。如果 R² 小于 0.5 必须删除,说明这一观测变量不符合信度要求。由表 4 可知正式问卷中各观测变量 R² 均大于 0.5,表明观测变量信度达到要求。此外,表 4 显示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检验值 CR 介于 0.7286-0.8574 间,均大于 0.6 临界值。表明模型通过了组合信度检验。通过数据内部一致性、观测变量信度与潜变量组合信度检验,表明问卷信度较高。

效度通常包括聚合效度与辨别效度。聚合效度指测度同一潜变量的不同测度题项即观测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区别效度指潜变量概念维度间的差异程度。聚合效度主要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来检验,本研究采用 spss15.0 软件运用最大方差法对原始数据的方差矩阵进行正交旋转,得出各因子在各测量

表 4 正交旋转因子负荷矩阵

观测变量	公因子		
	F ₁	F ₂	F ₃
CBGL1	.034	.814	-.115
CBGL2	.019	.857	-.018
CBGL3	.062	.880	.010
CBGL4	-.083	.836	-.036
KSXY1	.841	.063	.022
KSXY2	.911	.003	-.016
KSXY3	.893	.002	.086
KSXY4	.728	.042	-.021
KSXY5	.777	-.083	-.130
ZFH Y1	-.043	-.147	.837
ZFH Y2	-.073	-.006	.835
ZFH Y3	.006	.029	.863
ZFH Y4	.048	-.040	.776

表5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	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AVE	观测变量	观测变量标准化估计值	观测变量标准误差	T值
CBGL	0.6283	CBGL1	0.74	0.45	9.52
		CBGL2	0.81	0.35	10.73
		CBGL3	0.85	0.28	11.55
		CBGL4	0.77	0.41	9.97
KSXY	0.6288	KSXY1	0.82	0.33	11.36
		KSXY2	0.93	0.14	13.74
		KSXY3	0.87	0.25	12.34
		KSXY4	0.62	0.61	7.78
		KSXY5	0.68	0.54	8.64
ZFH Y	0.5894	ZFH Y1	0.80	0.36	10.36
		ZFH Y2	0.77	0.40	9.95
		ZFH Y3	0.82	0.33	10.76
		ZFH Y4	0.67	0.55	8.24

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值，如表4所示。

表4中所示各观测变量在相应公因子上的因子载荷在0.728-0.911间，均高于Bentler和Wu提出地临界值0.45，符合要求，说明一半以上方差由此相对应潜变量捕获，测量具有较好聚合效度。此外，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获取的各因子（观测变量）标准化估计值与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AVE）也可判别问卷的聚合效度水平，具体数据见下表5。

表5分析结果显示，各观测变量标准化估计值在0.60以上，而且T值分布于7.78-13.74区间， $p < 0.001$ 水平上显著，全部通过了T检验；各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也均大于0.5可接受水平。结合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充分聚合效度。

关于区别效度的检验可以通过观察潜变量与观测变量的交叉载荷系数数据矩阵(Bassellier, 2004)。如表5已描述，各观测变量对应的公因子上载荷系数均高于在其他非公因子上的载荷系数，这表明该测量模型具有较好区别效度。综合以上分析，说明本研究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此外，由表6中可知各指标标准误差在0.07-0.34间，误差较小，无重大误差，可以进一步对该模型进行拟合检验。

4.模型拟合度评价。通常模型检验的常用指数很多，一般研究主要采纳 χ^2 、df、RMSEA、AGFI、CFI、NFI、NNFI、IFI、GFI等指标，本文也选用了以上指标进行模型拟合度评价。 χ^2 使用频率非常高，它与自由度的比值一起说明模型正确性的概率，通常这一比值越接近1.0，就表示协方差矩阵和估计协方差矩阵间的相似度越大，模型拟合性越好，小于2视为理想结果，大于2小于5为可以接受。标准化残差均方根指数SRMR值低于0.08时表示模型拟合度佳；近似误差的均方差根RMSEA值小于0.05表示模型拟合度非常好，在0.05-0.08间表示拟合度较好，

表6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

指数名称	模型估计	参考标准值及来源
χ^2 (卡方检验值)	67.77	
df (自由度)	62	
χ^2/df	1.0937	<2 (Carmines & McIver,1981)
SRMR (残差均方根)	0.052	<0.08 (Hu & Bentler,1999)
GFI (拟合优度指数)	0.93	>0.90 (Bentler, 1983)
AGFI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	0.90	>0.90 (Hu & Bentler, 1999)
RMSEA (近似误差均方根)	0.015	<0.05 (Browne&Cudeck,1993)
NFI (标准拟合度指数)	0.94	>0.90 (Bentler & Bonett,1980)
NNFI (非正规拟合指数)	0.99	>0.90 (Bentler & Bonett,1980)
CFI (比较拟合指数)	0.99	>0.95 (Bentler, 1988)
IFI (增量拟合指数)	0.99	>0.90 (Hu & Bentler,1999)

0.08-0.10表示拟合度一般；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规范拟合指数NFI,非规范拟合指数NNFI一般要求大于0.9；比较拟合参数CFI越接近1.0表示拟合程度越好。本研究采用LISREL8.54软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了拟合度评价，各指标具体数值及参考值如下表6所示。

由表6可看出：本研究中测度模型 χ^2 与df比值为1.0937，大于1小于2，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SRMR为0.052小于0.08的参考值；RMSEA为0.038远远低于0.08的要求，说明模型拟合较好；NNFI与NFI都大于0.90说明模型拟合较好；而CFI和IFI接近于1说明模型拟合非常好；GFI大于0.9的标准符合要求，也表明了良好的拟合度；AGFI为0.90与参考值恰好相等，表明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综上，各个指标表明理论模型与数据适配程度较好，测度指标模型可接受。

四、指标测算方法与应用

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进行赋权，并构造测度函数。主成分分析法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将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一般是把 p 个原始变量 x_1, x_2, \dots, x_p 的总方差分解成 p 个相互独立的变量 Y_1, Y_2, \dots, Y_p 的方差之和 $\sum_{i=1}^p \lambda_i$ ， λ_i 表示第 i 个主成分。然后，通过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构造出各个主成分因子表达式： $F_i = \alpha_{1i}X_1 + \alpha_{2i}X_2 + \dots + \alpha_{pi}X_p$ ($i=1, 2, \dots, p$)。其中 α 代表各公因子得分系数， X 代表原始变量（测度指标具体得分值）。该方法在测度应对反倾销能力指标之间存在较高相关性时能消除指标间信息重叠，而且可以根据各主成分因子方差贡献率占有所有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重生成非人为的权重系数 θ_i ($i=1, 2, \dots, p$)，最后汇总可构造综合得分函数如下： $F = \theta_1 F_1 + \theta_2 F_2 + \dots + \theta_p F_p$ 。

本文应用SPSS15.0统计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使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策略，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获得了3个公共因子，因子提取结果见表7。

表7 因子提取结果

Component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1	3.518	27.061	27.061	3.518	27.061	27.061	3.491	26.855	26.855
2	3.083	23.712	50.774	3.083	23.712	50.774	2.907	22.362	49.218
3	2.584	19.879	70.652	2.584	19.879	70.652	2.787	21.435	70.652
4	.682	5.245	75.897						
5	.520	4.002	79.899						
6	.499	3.842	83.741						
7	.446	3.430	87.171						
8	.360	2.769	89.940						
9	.338	2.599	92.538						
10	.303	2.328	94.866						
11	.260	1.997	96.863						
12	.244	1.873	98.736						
13	.164	1.264	100.000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由表7可知旋转结果中三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2.7, 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了70.652%, 说明因子提取的总体效果较为理想。同时通过方差贡献率可获取3个主成份权重分别为: 0.38、0.34、0.28。此外, SPSS15.0统计软件在调用Factor Analyze过程中生成的因子得分系数表, 如表8。

因此, 根据表8主成份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各主成份因子表达式为:

$$F_1 = .005X_1 + 0.001X_2 + 0.013X_3 - 0.028X_4 + 0.241X_5 + 0.261X_6 + 0.257X_7 + 0.208X_8 + 0.222X_9 - 0.004X_{10} - 0.014X_{11} + 0.009X_{12} + 0.021X_{13}$$

$$F_2 = 0.278X_1 + 0.297X_2 + 0.305X_3 + 0.289X_4 + 0.019X_5 - 0.004X_6 - 0.001X_7 + 0.10X_8 - 0.037X_9 - 0.025X_{10} + 0.024X_{11} + 0.037X_{12} + 0.010X_{13}$$

$$F_3 = -0.016X_1 + 0.021X_2 + 0.032X_3 + 0.013X_4 + 0.017X_5 + 0.002X_6 + 0.039X_7 + 0.001X_8 - 0.043X_9 + 0.298X_{10} + 0.302X_{11} + 0.313X_{12} + 0.280X_{13}$$

最终构建测度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的综合函数为: $F = 0.38F_1 + 0.34F_2 + 0.28F_3$ 。

为验证与更加明确本研究设计的指标体系与测算方法, 本文展开算例研究。采用这一指标对某大型钢铁出口企业进行了应对反倾销能力的测度。为保证测度结果的公平性, 邀请该企业曾经参与过应诉反倾销实务的三位高管和两位财务人员、该企业所在地曾支持其应对反倾销的政府部门(商务局)中的两位相关人员, 以及钢铁协会曾协助该企业应诉反倾销的两位工作者分别按照测度指标进行打分(本指标体系采取Likert-7点尺度, 最大分值为7分, 按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各主成分权重计算满分为8.713)。然后, 运用主成份分析方法与已计算出的各主成分权重参数

(0.38、0.34、0.28)对每人的测度结果进行计算。最后,对测算结果汇总并取其均值为该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的最终结果。由于篇幅所限主成分表达式具体运算过程不再赘述,被测对象测算得分及应对反倾销能力最终得分,如表9。

经测算该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综合得分为3.024,这一分数占满分的34.71%,没有达到60%的及格线,说明该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位于中下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企业应对反倾销的应诉率与胜诉率虽然不能够完全说明应对反倾销的能力,但也可以部分反应这一水平。该企业在过去10年中受到反倾销调查的案件达到27起,其中参与应诉的比例为51.3%,但胜诉率不足30%。参考这一现实状况,应该说我们通过指标测度的结果还是比较客观的。企业通过运用所设计指标进行测度,不仅宏观上能够了解应对反倾销的能力水平,而且通过对指标的分值判断也能够从微观领域挖掘影响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的因素,从而为提升这一能力的策略方案与机制提供了导向性支持。

五、结论

应对反倾销不仅关系到企业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产业经济安全。从WTO公布的数据看,我国近些年是遭受反倾销最多、受害最大的国家。为此,通过反倾销应对能力的评估,提升反倾销应对能力,即能够保障国家利益、维护产业安全,又有助于企业发展。本文从文献研究入手,结合对反倾销涉案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与财务人员、行业协会参与应诉反倾销的工作者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公务员开展的深入访谈分析结果,选取了应对反倾销初始测量指标,进而设计了调查问卷。然后,经由问卷预测试与先导性测试,删除了1个指标保留了其他13个指标,并通过因子分析对获取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该测度指标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测度模型可以接受。最后,对指标测算方法进行了阐述,并结合具体企业应用本指标展开了算例研究。算例结果说明,所提出的指标与测算方法可以较好地测度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有助于挖掘影响应对反倾销能力的瓶颈因素,提升应对反倾销能力。

由于本文只是对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的探索性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由于调查难度与经费限制,收集的样本量有限,会导致样本代表性受到一定限制,这也是本研究缺憾之处。因此,通过扩大样本量检验本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也是我们下一步

表8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观测变量	Component		
	1	2	3
CBGL1	.005	.278	-.016
CBGL2	.001	.297	.021
CBGL3	.013	.305	.032
CBGL4	-.028	.289	.013
KSXY1	.241	.019	.017
KSXY2	.261	-.004	.002
KSXY3	.257	-.001	.039
KSXY4	.208	.010	.001
KSXY5	.222	-.037	-.043
ZFHY1	-.004	-.025	.298
ZFHY2	-.014	.024	.302
ZFHY3	.009	.037	.313
ZFHY4	.021	.010	.280

表9 被测对象测算得分及应对反倾销能力最终得分

被测对象	F ₁ 得分	F ₂ 得分	F ₃ 得分	F
1	3.165	2.610	4.244	3.278
2	3.371	3.561	2.127	3.087
3	2.797	3.251	3.051	3.022
4	3.273	3.194	3.581	3.332
5	3.448	3.245	2.784	3.193
6	4.131	2.267	3.426	3.210
7	2.179	3.211	2.845	2.716
8	3.017	2.408	2.217	2.586
9	2.142	3.094	3.314	2.794
最终得分	3.024			

工作的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 冯巧根, (2004) “反倾销应诉中的财务使命及其战,”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6期。
- 冯巨章, (2006) “反倾销联合应诉博弈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 林珏, (2008) “加入WTO以来国外对华反倾销特点、原因及对策,” 《世界经济研究》第4期。
- 刘爱东、曾志, (2009) “欧盟对华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的统计分析,”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1期。
- 刘爱东, 陈林荣, (2010) “三体联动” 应对反倾销成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第2期。
- 潘煜双, (2004) “反倾销应诉的关键——解读市场经济地位的会计标准,” 《国际贸易问题》第10期。
- 孙铮, 刘浩, (2005) “反倾销会计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辨析,” 《会计研究》第1期。
- 周友梅, (2003) “试论反倾销会计的若干问题,” 《当代财经》第11期。
- Bassellier, G., Benbasat, I, (2004) “Business Compete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Conceptual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n IT-business Relationship,” *MIS Quarterly* 28 (4) : 673-694.
- Churchill Jr., G.A., J.P. Peter, (1984) “Research Design Effects on the Reliability of Rating Scale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1) :48-63.
- Kaiser H F, (1974) “An Index of Factorial Simplicity,” *Psychometric* (39) :673-694.

(责任编辑 蒋荣兵)

Measure Index in Ability of Response to Antidumping Based on China's Experimental Evidence

LIU Ai-dong ZHAO Jin-li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questions, this paper refers 14 initial variable indexes to estimate anti-dumping measure ability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hen constructs the responses of anti-dumping ability measure indexes model. The paper selects collected data using factor analysis and establishes the final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does fit test to the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of indicators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the model has better goodness of fit. Finally, it starts the 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 apply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indicator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can better estimate the level of responses of anti-dumping, which is convenient to mining bottlenecks to deal with anti-dumping and enhance the capacity to respond to anti-dumping.

Keywords: Response to anti-dumping capacity; Measurement index; Indicator calculation; Estimation